

## 五〇年代臺灣流亡作家的恐懼與幻想

——以邱永漢《香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為研究對象

## 一、前言

邱永漢（1924-2012）出生於日據時期臺灣臺南市，父親為漢人，母親則為九州出生的日本人。1945年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同年返回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因向聯合國提出「實施台灣公民投票的請願書」，擔心會受到國民政府迫害，故流亡香港，輾轉於1954年移居日本。隔年（1955），其作品〈香港〉於日本《大眾文藝》上以日文刊載，隨即獲得當年下半期的第三十四屆「直木賞」，<sup>1</sup>亦為首位非日本裔的外國人獲得該獎項。後來重心逐漸轉移至財經界，1971年受邀回到臺灣投資發展，並創立《財訊》等經濟雜誌。在臺灣關於邱永漢的文學的討論一直不多，直到九〇年代開始才有學者為他在臺灣文學史上平反，爭取一席之地。

日本學者岡崎郁子把邱永漢長久以來被臺灣文壇漠視的原因概括成三點：其一，邱永漢的文學是以日文寫成，於日本發表。在戰後推崇國語而禁止日語的氛圍下，他的作品基本上無法打入臺灣市場；其二，邱永漢的作品（尤其是分別獲得與入選「直木賞」的〈香港〉與〈濁水溪〉）大多圍繞著二二八事件和臺灣獨立運動，在取材上完全是當時的禁忌，因此就算獲獎也難以被大肆報導；其三，邱永漢回臺後身分已變成經濟家，與當時的文壇甚少往來，故一般人很難得知其作為文學家的另外一面。邱永漢曾言自己「曾賭注生命挺身與台灣獨立運動」，<sup>2</sup>但這位為了臺灣的前途而奮不顧身的人物，他的故事卻要等到其半自傳式的小說〈香港〉與〈濁水溪〉譯成中文出版後，臺灣讀者才有機會略窺一斑。

〈香港〉一文描述主角賴木春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因曾經秘密結社，同伴相繼被捕收監，故逼不得已逃離故鄉臺灣前往香港。在香港這個以錢為上的資本社會中，像賴木春這種沒有身分、沒有資本的人如何夾縫求生，同時又如何面對無家可歸的失根感。邱永漢以社會底層作為故事情節的切入點，加上其「流亡」的身分，理所當然會被以為是他和其他流亡者／難民的共相，但在1994年以日文出版的自傳《わが青春の台湾 わが青春の香港》，<sup>3</sup>揭露了他當時的生活環境並非如小說所述的貧困，甚至在流亡兩年後就能擺脫寄人籬下的生活，享受相對富裕的生活，與小說所敘述的潦倒經歷差距甚大。因此本文將比較同一作者的文本，從自傳到小說，探討「半自傳式書寫」中的虛構性與真實性；從中分析作者在建構背景、場景以及主角的經歷時，投射

<sup>1</sup>〔日〕岡崎郁子：〈孕育文學的土壤——在台灣文學史上的邱永漢和西川滿的地位〉，「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1994年11月），頁3。

<sup>2</sup>〔日〕岡崎郁子著，涂翠花、葉笛、鄭清文譯：《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頁110。

<sup>3</sup>於1996年翻譯成中文版《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

出流亡者的心靈世界，試圖尋找五〇年代因政治因素流亡海外的作家所面對的掙扎與難關。

## 二、 半自傳小說的虛與實

邱永漢的作品於九〇年代開始被討論及研究，而以「自傳小說」或「半自傳小說」界定〈香港〉，亦是在同期開始散見於各論文之中。<sup>4</sup>大部分學者因為〈香港〉的時空設定與邱永漢本人的生命歷程脛合而斷定文本的自傳色彩。1994年出版的自傳，邱永漢以「早期在臺生活」及「暫居香港」區分並清楚交代前半生的經歷，始得與〈香港〉——以自身作為主角原型、以第三人稱的敘事角度改編個人經歷的小說作出具說服力的比較，得出「半自傳」的虛構成分。本章節抽取小說與自傳中具比較性的片段，得出虛實之間的界線、「賴木春」與「邱永漢」的異同，簡析邱永漢在創作〈香港〉時所刻意安排的情節及其用意。

〈香港〉裡的賴木春漏夜逃上前往廈門的機帆船，再轉乘飛機抵達香港，打算投靠素不相識，只是從前耳聞已經發跡的李明徵。料想不到「李明徵賺了大錢」只不過是傳言，賴木春逼不得已與其同居於鑽石山（當時為窮人的集居地）的木板房：

老李的房間是在木板屋中狹窄、陡急的梯子上去的頂樓。因為牆壁和鄰家連接，除了屋頂採光用的玻璃窗以外，沒有其他窗口。可以放二張單人床的空間也不過大約一坪而已，但因為放著舊木床的關係，房內就擠滿了。<sup>5</sup>

而當李明徵向賴木春索取二十塊港幣房租的時候，賴木春明明有錢，卻偏偏對其撒謊，訛稱錢在廈門被偷了。從生活環境的惡劣程度以及賴木春對花錢的斤斤計較這兩點，可知賴木春從一開始就是草根階層。反觀邱永漢的成長背景，從小他的父親就讓人陪自己去電影院看電影，而且對服裝品味有自己的追求：以織著山水畫的綢緞作內襯，做中國服的襯裏、腰帶繫著有長鏈的金懷錶、出門前又以手帕灑香水。<sup>6</sup>而邱永漢離開台北時身上「帶著一千美元」<sup>7</sup>，且抵達香港後隨即前往半島飯店與同伴會合，再投靠當時住在尖沙嘴的朋友，所暫居的府邸裡甚至有傭人幫忙。「半島酒店」、「尖沙嘴」、「傭人」這些符碼，以至小時候的經歷，都表示了他從小就享受著相對高級的生活品質。

〈香港〉的後半段，賴木春遇上了從中國到香港工作的妓女莉莉，二人發生感情。在此之前，賴木春和李明徵透過詐騙手段進行茶葉買賣，賺了好一筆錢。賴木春因此

<sup>4</sup> 早於1994年，岡崎郁子便以「自傳小說」定位〈香港〉。

<sup>5</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香港》（臺北，允晨文化，1996年），頁21。

<sup>6</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臺北，不二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頁8。

<sup>7</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118。

幫莉莉贖身，提出一起生活的希望。但他們的同居生活並不長久，後來莉莉向賴木春坦白：說自己早就在中國結婚，雖然她早就厭倦自己的丈夫，但因為他們之間有小孩，所以利利始終無法割捨，這段感情終究是無疾而終。相對於這種草根的愛情故事——勞動階層與妓女之間的戀愛，邱永漢的戀愛故事是相對平淡而「中產」的。在他已經擁有一定收入以後，透過相親與一廣東女子結婚，生下一個女兒：

可能是她（指廖府的女傭）的主意，我並沒有開口，住在附近的趙太太就來找我，說要替我做媒……因此我當場說「像我這種流浪漢居無定所……」而予以拒絕。

……「可是，我國的生活真的是明天要往何處都不知道哩。有了妻兒，會絆手絆腳。」<sup>8</sup>

可見邱永漢對「戀愛」這件事本身並沒有太大的意欲，反而覺得自己的身分並不適合成家，與賴木春和莉莉充滿張力的戲劇化情節不同：與妓女談戀愛本來就是一種「打破禁忌」的情節，像中國傳統文學中的杜十娘與李香君，都是妓女的愛情悲劇。「妓女」正是社會上典型的「小人物」，與〈香港〉裡面其他男性角色在某程度上一樣，都是以出賣自身／勞力以賺取金錢。他們各自承載著不同原因而離鄉背井，但終究還是困在營營役役的生活裡頭。

### 三、 流亡者的心靈世界

從自傳到小說的比較，可以把邱永漢這種「故意刻畫貧困、世故，為了生活糊口而不惜一切代價」的誇張手法歸納成兩個原因：

一是為了要成名賺錢。據自傳所述，邱永漢赴日是有一種打算「到成為小說家能維持生計為止」的心態。<sup>9</sup>從他拿著自己的處女作〈偷渡者手記〉去拜訪西川滿，便可得知其對於成為小說家的夢。要以小說家作為職業，而且要以此養家糊口，再加上〈香港〉是繼〈濁水溪〉入選直木賞後發表之作，由此可以推斷這階段的創作難免會帶有一舉成名的希望，因此在故事情節上作相對煽情的安排也是情理之中。其二則是以戲劇化的情節，映射在流亡的歷程中的個人想法或是為同路人寫出心中共鳴，像〈香港〉這種起伏不定的敘述模式與當時從大陸逃亡香港的南來作家不謀而合：同樣描寫對前景感到渺茫而無力；或是只能苦熬，在弱肉強食的社會中掙扎浮沈。<sup>10</sup>

而邱永漢透過〈香港〉所映射的想法，大致可分為兩種：恐懼與幻想。「恐懼」是關乎現實層面、站在顧慮將來的角度而對貧困有所恐懼，擔心身上的錢總有一天會

<sup>8</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 152。

<sup>9</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 190。

<sup>10</sup> 趙稀方：〈五十年代的香港難民小說〉，《流離與歸屬：二戰後港臺文學與其他》，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頁 79。

用完，而不得不拼命去為錢而奔波；「幻想」則是關乎心靈層面、站在回顧當初的角度而對新天地、自由世界的期盼與破滅。

### (一) 對「貧困」的恐懼

流亡者對「貧困」的恐懼是緣於「流亡」在本質上的不穩定性，以及對流亡地的不熟悉。邱永漢在自傳中有如下的敘述：

一天有一天連續不安的日子。孤零零一個人投入香港這異鄉，以往的經歷毫無用處，我不得不痛切地感到自己的軟弱無力。首先，我沒有錢。沒有錢但假使有親戚朋友的幫助，也許還可以勉強度日。但也沒有親友，那就只有提供勞力賺取生活所需了。<sup>11</sup>

把香港定義成「異鄉」；把自己定位成淪落的異鄉人，在流亡者中「定居」的概念並不存在，正是不穩定性的由來。邱永漢並沒有試圖在香港重新建立一種地域上的認同感或好感。〈香港〉的認同感是建立在「生存」上的：（一種）關於「哪裡有路那裡就是認同」的自我定位，是這樣如動物般的生存本能驅使才是〈香港〉所展現的認同。<sup>12</sup>這種由本能所催生的認同，基本上已經與其他非現實的層面脫鉤，譬如政治取向、理想抱負等。換句話說，「如何生存下去」才是流亡者共同的、最迫切的恐懼：

我要離開台北時，身上只帶著一千美元……但不會賺錢，也沒有其他收入管道的人口袋中的一千美元，是用掉一元就減少一元，令人不安的一千美元。<sup>13</sup>

在〈香港〉中李明徵對賴木春的一番提醒，也說明了「生存下去」凌駕於任何政治理想：

也許在不久之前，這些人（指茶樓中那些從中國逃出高等難民）還是國粹主義者。也就是說，會成為左派的人也會成為右派。在窮鄉末路時人都很類似。我輕視這種人，但不責備這種人。因為我也不曉得多少次想 依靠別人生存哩。<sup>14</sup>

邱永漢對賴木春這個角色投放了許多個人的價值觀，以悲觀的對話揭露出一個人如何因為因為看過政權的腐敗、社會的動盪，而衍生出一種金錢至上主義。賴木春經常把金錢掛在嘴邊，而且都是帶有負面行的描述，譬如「在香港這個地方沒有錢就只

<sup>11</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 125。

<sup>12</sup> 翁智琦：〈流亡時代的香港書寫：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與邱永漢《香港》〉，「第十二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論文，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13年7月，頁 12。

<sup>13</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 118。

<sup>14</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香港》，頁 141。

有投海，所以用錢非得再三考慮不可」<sup>15</sup>、「凡事錢當先，沒有錢的人再怎麼去努力都於事無補」等，<sup>16</sup>與他自傳裡所擔憂的事情同出一徹。岡崎郁子更提出，邱永漢的小說裡對「金錢與賺錢」描寫特別詳細，每當有「混水摸魚企圖賺錢的人物登場」，其描寫就「細緻入微，筆鋒格外犀利……倒令人覺得：難怪興趣要轉變到金錢本身的」。<sup>17</sup>證實的這種流亡經歷，使得流亡者以「生存」為先，尤其在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變成了它們最大的追求，同樣是最大的恐懼。

## (二) 對「自由」的幻想與破滅

早於流亡香港以前，邱永漢便已展露出對自由的追求。從自傳所述，他認為「從大陸來的政府視台灣人知識階級為眼中釘」，<sup>18</sup>當時的國民政府在政治上貶抑從日據時期就在臺灣的知識階層和有聲望者，視他們為受日本帝國主義毒害的份子，而重用隨大陸政府回臺的外省人。廖文毅當時創辦的「前鋒雜誌」，目的正是集合被政府忽視而感到不滿的知識分子，又定期召開名為「省都無力者會議」的座談會。<sup>19</sup>當時二十出頭的邱永漢因為興趣，且自認為同樣被國民政府視為眼中釘而不時前往旁聽，據廖文毅姪子廖史豪後來口述，邱永漢日後的確成為了「前鋒雜誌」的撰稿員之一。<sup>20</sup>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邱永漢認為國民黨在大陸節節敗退，為了鞏固「臺灣」這條後路而向台灣人嚴刑鎮壓，唯有「把台灣從國民黨統治中切離」，<sup>21</sup>自己才能全身而退，不被捲入這種內部抗爭之中。因此他試圖向廖史豪打聽廖文毅兄弟的消息，輾轉認識了莊要傳與林益謙等人，<sup>22</sup>也確認了自己希望臺灣人民能得到自由，不再受壓迫的想法，才引伸後來向聯合會遞交請願書一事，並因此展開逃亡。

而當邱永漢成功抵達香港，所謂「逃出生天的自由」，並沒有導向真正的「自由」，反而是導向為了生存而沒有選擇餘地的「滅亡的自由」：

我們是愛自由而拋棄故鄉的。我們是追求自由而來到這裡的。然而，我們所到的自由，是滅亡的自由、餓死的自由、自殺的自由，都是沒有資格作為人類的自由。<sup>23</sup>

<sup>15</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香港》，頁 20。

<sup>16</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香港》，頁 90。

<sup>17</sup> [日] 岡崎郁子著，涂翠花、葉笛、鄭清文譯：《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頁 120-121。

<sup>18</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 78。

<sup>19</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 80。

<sup>20</sup>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紀錄：《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臺北，吳三連基金會，2000 年），頁 29。

<sup>21</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 87。

<sup>22</sup> 莊要傳曾任朝日新聞香港特派員；林益謙為當時華南銀行研究室主任，三人曾一同商議草擬「實施台灣公民投票的請願書」。

<sup>23</sup>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香港》，頁 47。

邱永漢透過〈香港〉的賴木說出對「自由」的想法，在這段近乎聲嘶力竭的呼喊裡，充滿著失望感與悔恨感。「流亡」是一種表示到達極限的生存方式，而且是極為「現實的」抉擇，<sup>24</sup>流亡者必須拋棄過往的一切，在此強調著一種「把生命抵押」，卻連一點回報都得不到的巨大打擊。邱永漢最初因政治理由而離開台灣，面對政治上的箝制與不自由，「由知識份子所致力打造的政治之夢」<sup>25</sup>理所當然成為了他的對「自由世界」的幻想。但流亡到香港之後卻被「生存」、「糊口」這些現實層面的問題重重勒緊，理想的自由世界不但幻滅，連基本的日常生活的需要煩惱，甚至背負著永遠不能重返故鄉的失根感、緬懷感與渺茫感。

比較同一時期南來作家的流亡文學，充滿著各種逃亡的因由，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苦衷與目的，每個人都是為了尋找更美好的自由世界而離開，「自由」永遠是所有流亡者的終極期盼。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sup>26</sup>描述一群痛恨共產黨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逃到香港後淪為難民，為現實折腰卻互相扶持，不屈服於命運的故事。<sup>27</sup>作為「反共文學」的代表作品，它所表達的態度與價值已在其他學者的研究中有詳細論析，在此先不贅述。在此要表達的重點，是《半下流社會》裡的逃亡路徑，恰巧與〈香港〉的相反，但遭遇卻是雷同。趙滋蕃的反共心態是在於把自由世界投放在臺灣與國民黨，但邱永漢的經歷卻說明了臺灣也並非一個自由世界。當然這是作為旁觀者的比較，才會產生出這種諷刺感，但事實上也證明了：「自由」只是一個隨時會被打破的泡沫，會隨著流亡所承受的切身問題而逐漸崩解。

#### 四、 結語

前人對於研究五〇年代流亡香港的作家，多數會聚焦於探討右翼南來作家以及其反共文學，原因是從臺灣流亡到香港的例子較少，故以此作為小說舞台的作品則更少。〈香港〉承載著幾乎遭人遺忘的歷史，絕無僅有地描述了因為二二八事件而從臺灣流亡到香港的一小撮人，他們的流亡經歷與情感思想。本文透過比較半自傳小說與自傳的方式，尋找出邱永漢營造和鋪排情節背後所映射的感受——因為失根感和自由理想的幻滅而產生的強烈不安、恐懼，唯有資本、金錢才是流亡生命中最後能抓住的浮木。故此，「自由的幻想與破滅」與「對生存、金錢的恐懼」兩者其實是互相影響，共構成流亡者的掙扎。對於流亡，有學者認為「反共的流亡文學」有著「個人的或集體的受難經驗之描摹，卻往往無人搭救……從身心俱疲到血肉模糊，這些都是當年的流亡者

<sup>24</sup> [日]川村湊作，陳明台譯：〈歸屬和認同——比較邱永漢和吳濁流的作品〉，《文學台灣》第44期，2002年10月，頁206。

<sup>25</sup> 翁智琦：〈流亡時代的香港書寫：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與邱永漢《香港》〉，「第十二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論文，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13年7月，頁11。

<sup>26</sup> 趙滋蕃（1924-1986），於1950年移居香港，1953年出版《半下流社會》，1964年移居台灣。

<sup>27</sup> 黃冠翔：《異鄉情願：臺灣作家的香港書寫》，臺北，獨立作家，2014年，頁48。

後世讀者所展示的流亡受難圖。」<sup>28</sup>但這段話套用在邱永漢的小說上同樣適合：小說裡的角色只能試圖自救，往往變成了與殘酷社會的搏鬥，生存變成當下最重要的問題，不只小說裡的貧窮的賴木春，連邱永漢本人也擔心錢總有日會用完。正如他透過小說重複表達的「自由」，所謂「自由」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都敵不過現實的難關。邱永漢日後逐漸走向經濟家之路，彷彿也因此有跡可循。

## 五、 參考資料

### (一) 文獻專書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香港》，臺北，允晨文化，1996年。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臺北，不二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濁水溪》，臺北，允晨文化，1995年。

〔日〕岡崎郁子著，涂翠花、葉笛、鄭清文譯：《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

〔日〕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紀錄：《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冊）》，臺北，吳三連基金會，2000年。

黃冠翔：《異鄉情願：臺灣作家的香港書寫》，臺北，獨立作家，2014年。

### (二) 期刊／會議論文、論文集

〔日〕川村湊作，陳明台譯：〈歸屬和認同——比較邱永漢和吳濁流的作品〉，《文學台灣》第44期，2002年10月，頁201-207。

李昀瑾：〈自我認同的糾葛與分裂——以邱永漢《濁水溪》為考察對象〉，《台灣文學評論》第八卷第一期，2008年1月，頁6-19。

〔日〕岡崎郁子：〈孕育文學的土壤——在台灣文學史上的邱永漢和西川滿的地位〉，「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1994年11月。

翁智琦：〈流亡時代的香港書寫：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與邱永漢《香港》〉，「第十二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論文，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13年7月。

陳建忠：〈流亡者的歷史見證與自我救贖：由「歷史文學」與「流亡文學」的角度重讀台灣反共小說〉，《文史台灣學報》第2期，2010年12月，頁9-44。

<sup>28</sup> 陳建忠：〈流亡者的歷史見證與自我救贖：由「歷史文學」與「流亡文學」的角度重讀台灣反共小說〉，《文史台灣學報》第2期，2010年12月，頁35。

趙稀方：〈五十年代的香港難民小說〉，《流離與歸屬：二戰後港臺文學與其他》，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頁73-91。

